

與世界對話：澳門文學的可能性

——評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

霍超群

[摘要] 《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是一本具有開創意義的學術著作，它從漢語新文學的角度重新定位澳門文學，探討其從“邊緣”走向“世界”的可能；指出澳門的文化熱土效應，揭示澳門文學的“原生態”意義，引導人們省思文學評價的標準；委婉批評了澳門文學目前存在着自我封閉、自我設限的理論藉口，呼籲在“澳門學”的意義上重新思考“澳門文學”這一學術概念。

[關鍵詞] 澳門 文學 《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 朱壽桐 澳門學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傑出研究者，朱壽桐教授一直以來都十分強調學術研究的“必要性”和研究者的“責任意識”，從最開始的社團研究到後來的流派研究，再到近年來的“漢語新文學”倡言，均能看出他企圖開創新的學術格局的野心和膽魄。當他以這樣的學術慣性考察至今面目仍有些模糊、常作為附驥被提及的澳門文學時，澳門文學會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呢？2018年底出版的《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一書給我們提供了不一樣的答案。

一、從邊緣走向世界：漢語新文學視域下的澳門文學

朱壽桐注意到，強調澳門文學的世界性意義，首先要做的一項工作便是重估澳門文學的角色和定位。改革開放以來，台灣和香港地區的文學相繼進入大陸學者的研究視野，儘管澳門本土在20世紀80年代初也開始陸續討論澳門文學形象的問題，但由於澳門地域面積狹小，文化輸出意識薄弱，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平台上，澳門文學始終位處邊緣、難有發揮。這樣的學術認知使得即便是出現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也只能將其命名為“邊緣的解讀”。^①澳門本地的研究者或出於自謙，或囿於現實，認為自己所研究的澳門文學和文化在兩岸四地是“隱形”的存在。^②“邊緣”也好，“隱形”也罷，儘管在表述上有些差別，但他們似乎都承認澳門文學在越來越穩固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座標中是較為次要的。

作者簡介：霍超群，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23

① 饒芃子、莫嘉麗等著：《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② 李展鵬：《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新北：遠足文化，2018年。

在《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一書中，作者對這種由來已久的學術判斷表達了不滿，並提出了強而有力的學術依據。他認為“澳門是東亞社會近代化的橋頭堡，中國和日本與西方世界的最初接觸乃是從澳門起步的”，^①換言之，澳門文學值得被敘說的歷史遠不止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它所承載的近代風雲的文化記憶顯然也需要進行必要的描述。朱壽桐運用了歷史的長鏡頭，將澳門拉回到中西交匯的起點，以此重新定位澳門文學。他所借助的視角是漢語新文學的視角。漢語新文學的提出，最初是為了避免在國家、政治歸屬的意義上去界定現在越來越多的海外寫作者所帶來的局限與尷尬，但這個倡言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命名的問題，背後還蘊含着一套新的文學史觀，即從語言的角度重新整合長期被人為分割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台港澳文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朱壽桐認為文學史的可操作性也同樣重要，他為此編著了《漢語新文學通史》、撰寫了《漢語新文學通論》，而以漢語新文學的角度重新審視澳門文學，則是《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的潛在責任，也成為了澳門文學研究的全新面向。朱壽桐通過漢語新文學的視角，提攝了澳門文學的世界性意義，那就是中國融入世界、擁抱海洋文明的最初的完整的記憶。黎湘萍曾指出：“台、港、澳這三個空間的相似處，是它們都曾從原來的‘時間’脈絡中被切割出去，進入‘他者’的‘時間’之中，並從此在‘他者’的‘時間’中展開另外一條敘述與構建‘自我’的歷程。在這一歷程中，‘他者’融入了‘自我’，‘自我’包含着‘他者’。……它被充分地表現於這些地區的文學之中，構成了‘海洋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華人面向海洋、對外交流的先鋒。這些文學作品，記載着‘海洋中國’在‘時間’轉換過程中所必須面對的政治與文化衝突或融合的記憶與夢想。”^②如果說，黎湘萍指出了台港澳三地文學的共性之一在於個體面對“海洋中國”時生發出了“時間”與“自我”的疑問，那麼，朱壽桐則自信地表示，與海洋有關的記憶應“從澳門說起”。是的，作為一個從“海風吹來的城市”，^③澳門城市記憶的開端、發展的動力與海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只不過我們通常將這些文學表達解讀為澳門文學中的地域特色，而沒有上升到如朱壽桐所言的那樣：“它（按：澳門文學）作為澳門文化的參與者和澳門歷史的見證者，……具有某種全球史的價值。”^④循此邏輯，澳門文學自然不是可有可無的邊緣板塊，而是考察近代中國如何走向世界時不得不細緻爬梳的文化標本。

朱壽桐在《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一書中以宏闊的視野指出了澳門文學在世界座標系中的潛在價值，這種讓人耳目一新的學術呈現使得澳門文學有可能擺脫原有的“邊緣”處境，變得厚重、豐富、複雜，由區域化而世界化。“從頭說起”的眼光和膽量既能夠鼓舞澳門文學研究者的“士氣”，激勵其開展更深入的研究，又能為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生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徑。

二、揭示澳門文學的“原生態”意義

朱壽桐顯然不滿足於僅僅停留在方法論的層面上重新定位澳門文學，他還試圖通過具體的例子論證澳門文學對漢語新文學的學術貢獻，於是，“文學熱土”這一原創理論成為了此書的另一亮點。

①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59頁。

② 黎湘萍：《從邊緣返回中心》，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27頁。

③ 這一表述出自嚴忠明：《一個海風吹來的城市：早期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99頁。

所謂文學熱土，即是“澳門以高度自由的發表環境，強有力的政府或社團支持，以及文學寫作者在自然人口中所佔的相對高比例，塑造了一派充滿自然意味的文學生態，並造就了一方引人注目的文學熱土”。^①熱土效應帶來的則是澳門文學的“原生態”價值——“所有的文學事業通常在民間化、非意識形態化和非經典化的意義上進行，這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學生態，相對自然，幾近於文化原生態”。^②也就是說，澳門的創作者可以在完全自如的狀態下進行寫作，留滯於民間，沉潛於自我，於怡情悅性之外綻放各自的才情與魅力。這種生態是樸實的，也是自由的。可以想見，朱壽桐的這一學術判斷需要通過閱讀大量的澳門文學作品、尤其是刊登在報紙副刊上的“框框文章”才能提煉出來，儘管他在此書中並沒有很細緻地展開具體的作家和作品分析。

確實如此，澳門文學的一個顯著特徵在於它的性情化寫作，出於個人感興的作品比比皆是，給人一種隨性、平和甚至平淡的感覺，這當然與這個地區長期生活穩定、文化和諧有密切的關係。那麼，澳門文學的原生態特色能夠為整個漢語新文學帶來甚麼啟示呢？朱壽桐試圖借此引導人們省思文學經典化的運作模式，他在此書中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即文學的價值到底在於“優選”經典還是在於一般人生的怡情悅性？作為研究者，我們可能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前者，因為對每個出現的作家進行選汰、排位、促成其經典化，是文學研究的一項必要工作，而當我們帶着這樣的思維去閱讀澳門文學時，不久便會興趣索然，因為這裏的文學大概很難成為我們心目中期待的類型，但是朱壽桐卻認為，這恰恰提供了一個讓我們反思當下理論缺陷的機會——面對這樣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研究對象，我們應以怎樣的新框架、新理路去接近它？這對研究者來說，無疑是一項十分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朱壽桐揭示了澳門文學的“原生態”意義，應該說，再一次證明了澳門文學的“文化價值”具有重要的學術含量。不過，他在肯定澳門是一個能夠讓普羅大眾實現“文學夢”的場域的同時，又對這種原生態的文學品相感到擔憂，甚至毫不諱言地說，“誰都不願意以這樣的基色和基質代表澳門的文學形象”，^③這當中是否夾雜着澳門文學研究者的某種焦慮？其實，文學在澳門能夠產生熱土效應，是否說明了澳門文學本身無法與大眾化和低門檻脫離關係？“原生態”的意義與局限本身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如果認為澳門文學既要保持原生態的熱與力，又要達到與世界齊肩的高度，有可能會將澳門文學帶入兩難的窘境，因為文學熱土散發的活力極有可能造成文學純度的消解。

當朱壽桐以原生態的角度閱讀、理解澳門文學時，可能容易忽略澳門作家為“轉型”而進行的努力。實際上，回歸以來，澳門社會的巨變刺激了澳門作家集中思考移民、本土、全球化等“當下性”很強的話題，不少佳作隨之誕生。2016年，李宇樑的《上帝之眼》和梁淑淇的《我和我的……》入選了“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20部”，對澳門文學的“跨域”傳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們當然不是依賴所謂的“文化價值”取勝，而是體現出作者天馬行空的構思和純熟精湛的技法，這些作品都有待研究者去分析和評價。誠然，澳門文學的整體格局依然如朱壽桐所概括的那樣具有“原生態”的文化價值，但也要看到某些優秀的作品已經擺脫了“原生態”所帶來的局限，它們應該更有資格代表澳門的文學成就。這樣，我們在評價澳門文學時才會更加公允。

①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15頁。

②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21頁。

③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16頁。

三、“澳門文學”再思考

朱壽桐對澳門文學的所有“新解”，可能與他對“澳門文學”這一概念的重新思考有關。對於我們理解的“澳門文學”，可簡化為三個方面，其一是在澳門地區創作的文學，其二是澳門作家創作的文學，其三是書寫澳門的文學。不管是突出創作環境、作家籍貫還是突出作品內容，強調“澳門”的“區域”屬性是這三種詮釋話語的共同之處，但朱壽桐似乎有意要打破這種思維慣性，企圖在此書中重新定義“澳門文學”。

在他的構想中，“澳門文學”絕不止於區域文學，而應作為澳門學的一個重要分量發揮作用。他強調澳門文學只有放在這一框架內，才有可能達到藝術的制高點，才更有利於高水平地建構澳門文學形象。從這一視角出發，朱壽桐委婉地批評了澳門文學目前存在着自我封閉、自我設限的理論藉口，即“一切以澳門特色為寄託，以澳門接受為滿足”，他認為這可能是“澳門文學”這一名稱所帶來的“聲名之累”。

在筆者看來，澳門文壇對“澳門特色”的孜孜以求，與回歸以來不斷升溫的本土思潮密切相關，換言之，澳門作家如何理解“澳門”和“澳門文學”，觸及到了他們與“本土”的複雜糾葛。朱壽桐曾以“文學運作”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其實，這一術語挪用到澳門文學上也是成立的。當代澳門漢語文學的開枝散葉同樣離不開澳門內外的作家、學者、新舊媒體的有意“運作”，無論是對建立澳門文學形象的呼籲，還是“澳門文學獎”的評審對本土題材的鼓勵，抑或是當下十分新潮的文學跨界，都可看出澳門文學本土化的運作痕跡。這樣，也許便不難理解，“澳門文學”為何總離不開“文學澳門”，正如此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整個漢語文學世界，沒有一個區域像澳門這樣，作家們的創作熱忱幾乎完全聚焦於自己的小城故事，他們的創作之火似乎只接受小城文化作為燃料，而小城澳門也正需要這樣的火光為之燭照”。^①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種創作心態？從長遠來說，澳門文學當然不能僅僅滿足於區域文學的定位，但它或許首先需要必要的本土視維使它“名副其實”，而不僅僅是一個在政策關照下的“特區文學”。倘若借助所謂的澳門特色，有助於其主體性身份的確立和穩固，使得這個地區的文學有資格和信心在兩岸四地的交流中較充分地表達自我，逐步擺脫於邊緣觀望和試探的困境，筆者認為不妨將澳門文學目前對“區域特色”的依賴視作其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事實上，我們可能很難要求澳門作家在短時間內否定自身，即捨棄才剛被啟動不久的本土情懷去創作那些被認為是與“世界”共振的故事，尤其是當我們嘗試着去把握澳門文學的走向時，可以大致確定他們未來的表達思路和思考軌跡並不會與“本土”離得太遠。但筆者並不認為朱壽桐對澳門作家提出的要求過於苛刻，因為此書已從各個方面揭示出澳門文學的的確確具備了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澳門文學任重道遠。從這個層面上說，朱壽桐在《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對“澳門文學”這一概念的再思考，表達了他對澳門作家／文壇所寄予的厚望，這一“表達”本身同樣具有前瞻性意義。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89頁。